

嘉靖四十三年“三門之役”之具體戰場考實*

吳宏岐

[摘要]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葡聯軍平滅柘林叛兵的“三門之役”，是中國海防史與中葡關係史的重要議題，學界通常籠統地說其戰場是在東莞虎門附近之三門海。本文根據相關中外史料，尤其是利用明清輿圖資料並結合西方傳教士檔案史料，通過細緻的考證，確定此役的具體戰場是在東莞虎門東南的三門口內的港灣內。本文還進一步分析了柘林叛兵退守三門口一帶的原因，指出俞大猷正是抓住了柘林叛兵防守策略上的失誤，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勢從容佈置，指揮明葡聯軍順利取得了“三門之役”的完勝。

[關鍵詞] 三門之役 三門海 三門口 地理形勢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月（4月），潮州饒平縣柘林澳水兵因缺餉斷糧而嘩變，史稱“柘林兵變”。叛兵隊伍在廣東東莞籍水兵徐永泰等人的率領下，聯合其他一些武裝，進抵虎門一帶的海域，對兵力空虛的廣州構成嚴重威脅，並侵擾澳門一帶海面。同年10月，為了消滅叛兵餘黨，廣東軍方與澳門的葡萄牙軍隊聯合行動，以突然襲擊的戰術，在東莞三門口一帶徹底平滅叛兵，史稱“三門之役”。^①關於這次戰役，目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重點也主要集中於中葡聯合平叛一事所反映的中葡關係史、柘林兵變的原因及其影響等方面，對“三門之役”本身的相關問題論述較為簡單，不少問題尚沒有完全搞清楚。^②“三門之役”是中國海防史與中葡關係史的重要議題，本文擬從歷史軍事地理的研究視角，根據相關中外史料，尤其是利用明清輿圖資料並結合西方傳教士的檔案史料，對其具體戰場作比較細緻的研究。

作者簡介：吳宏岐，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學博士。廣州 510632

* 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號：12&ZD144）階段性研究成果。

- ① [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15《論夷商不得恃功恣橫》，[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3頁。
- ② 參見黃慶華：《對明代中葡關係中幾個問題的考察》，《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2005年第6期；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98—211頁；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132頁；陳文源：《閩商與澳門早期社會》，《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2期；陳賢波：《柘林兵變與明代中後期廣東的海防體制》，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國家航海》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

一、學術界關於“三門之役”具體戰場的兩種說法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柘林兵變”，是與“三門之役”緊密相關的事件。這次兵變的主要起因在於朝廷一連數月未給戍守柘林澳的廣東東莞籍水兵發放糧餉。《明實錄》對此有較為明確的記載：“廣東東莞水兵徐永泰四百人守柘林澳。五月無糧，皆怨望思亂。會領軍指揮韓朝陽傳總兵俞大猷檄，調戍潮陽海港。諸軍益怒，遂鼓噪執朝陽，數入外洋，與東莞鹽徒及海南柵諸寇合，進逼省城。撫按官遣人責問亂故，以潮州知府何寵不發軍糧對。潮陽亦歸罪千戶于英。事聞，詔下朝陽、寵、英于御史問。奪海道副使方逢時、僉事徐甫宰，戴罪殺毛賊。”^①

由於兵變之際正值農曆三四月份，東莞叛兵利用東北季風，^②由潮州海面向西南方向一路流竄，進抵珠江口一帶，“突至莞城”，^③進而“橫肆鈔掠，省會戒嚴”。^④叛兵甚至企圖攻佔澳門，^⑤局面一度相當嚴重。在與叛兵的交戰中，明軍多次失利，不得不借助澳門葡萄牙人的力量來剿滅叛兵。明人葉權記載說：“湯總兵克寬與戰，連敗衄，乃使誘濠鏡澳夷人，約以免其抽分，令助攻之……”^⑥

至於平定東莞叛兵的過程，據郭棐《粵大記》記載：“（兩廣總督吳）桂芳聞變，陽布令招之，隨調東莞南頭九鋪水兵自外洋入；因躬督副總兵湯克寬、參將門崇文水兵自惠陽趣東洲裏海而出，合擊之。賊腹背受敵，駭奔無措，生擒六百一十二人，斬首不計。已而，餘黨復據大艦不解，桂芳與總兵俞大猷用計破之，復生擒三百九十三人，斬首四十一顆，首賊譚允傳、盧君兆等先後磔於市。其船入官，遺孽無存，遠近稱快。”^⑦類似的記載亦見於應櫟等修《蒼梧總督軍門志》、^⑧郭子章《潮中雜記》。^⑨上引《粵大記》中的提到的“桂芳與總兵俞大猷用計破之”一事，有論者認為“包括俞大猷借助葡兵，即所謂‘用夷商以制叛兵’”，^⑩頗有道理。由此可

- ① 《明實錄》卷532，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8661—8662頁。
- ② 關於柘林叛兵利用季風由潮州南下的情況，陳賢波在《論吳桂芳與嘉靖末年廣東海防》（《軍事歷史研究》2013年第4期）一度誤述為“正值3月份東南季風期，船隻南下無需唱風，得天時之便”，後在《柘林兵變與明代中後期廣東的海防體制》一文中更正為“正值農曆三四月份，東南沿海受東北季風影響，船隻自潮州出海南下，無需唱風，得‘天時’之便”。
- ③ [明]張二果、曾起莘：《（崇禎）東莞縣志》卷3《兵防》，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二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58頁。
- ④ [明]郭子章：《潮中雜記》卷11《國朝平寇考下》，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3年，第80頁。
- ⑤ [葡]羅理路（R. M. Loureiro）：《澳門尋根》，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27頁。
- ⑥ [明]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4頁。
- ⑦ [明]郭棐撰：《粵大記》卷3《海島澄波》，黃國聲、鄧貴忠點校，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8頁。按：“東莞南頭九鋪”，點校本作“東莞南頭、九鋪”，誤。
- ⑧ [明]應櫟等修：《蒼梧總督軍門志》，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第203—204頁。
- ⑨ [明]郭子章：《潮中雜記》卷11《國朝平寇考下》，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3年，第80頁。另參見王琳乾、吳坤祥、陳驊輯編點校：《明代倭寇禍潮與潮汕軍民抗倭資料》，潮州：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文化局，2003年，第182—183頁。按：此書所錄《國朝平寇考下》中，“東莞南頭九鋪”標點作“東莞、南頭、九鋪”；“自惠陽東洲裏海而出，合擊之”標點作“自惠陽東洲，裏海而出合擊之”，均誤。
- ⑩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206頁。按：黃氏所引《粵大記》相關文字的標點多有不同，並且“已而，餘黨復據大艦不解”誤作“而餘黨復據大艦不解”；另外，《粵大記》中有“首賊譚允傳”，似與《明實錄》中所說的“廣東東莞水兵徐永泰”為同一人。

知，明朝官軍平定柘林叛兵，實際上大致包括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兩廣總督吳桂芳調動東莞南頭九鋪水兵與副總兵湯克寬、參將門崇文麾下水兵，採用內外合地擊之戰術，使叛兵遭到重創，可能戰事涉及地點較多，史書記載不太明確，但大致不出省城廣州與東莞之間的海面或河道，而以發生在東莞縣城一帶水域的可能性較大；^①第二個階段是兩廣總督吳桂芳與總兵俞大猷借助澳門葡兵，將叛兵餘黨全部平定，而其戰事地點，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可知主要是在東莞三門口一帶。所以，通常說的“三門之役”，實際上只是指明朝軍隊聯合澳門葡兵，在東莞三門口一帶將叛兵餘黨全部平定的戰事。有一些著述由於對相關史料梳理未清，以至於將這兩次戰役混為一談。^②

關於“三門之役”的具體戰場，黃慶華在其《對明代中葡關係中幾個問題的考察》一文中，論述說“是年10月7日，葡萄牙方面由路易士·德·梅羅（Luís de Melo）和迪奧戈·佩雷拉指揮的11艘兵船及300名士兵，廣東方面由總兵率領的25艘戰船，集結於叛兵據守的海澳附近之後，很快向叛兵發起進攻，僅30分鐘就結束了戰鬥”。其中所謂的“海澳”，作者特別加注說明：“即虎門附近之三門海。見俞大猷《正氣堂集》卷15，《計叛兵必伏誅》。”^③作者所著《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冊也有大致相同之說法。^④《澳門編年史》的說法略有不同，認為“雙方激戰於東莞虎頭門之外之三門海”。^⑤

今按，上述兩種說法的共同點是都認為“三門之役”的具體戰場是在“三門海”，只是一說此海在“虎門附近”，一說在“虎頭門之外”。這些說法的依據是甚麼？兩說的提出者均未明言，但筆者推測極有可能是依據隆慶三年（1569）閏六月初九日俞大猷在《書與巡撫熊及二道》中的有關記載：“昔東莞叛兵有大烏船三十隻，白艚船四十隻。猷差人往撫，一一聽命……次日，果送大烏船十隻至虎頭門，猷差兵駕來五羊驛前……次日，果送烏船十一隻至虎頭門，猷差兵駕來五羊驛前。”^⑥這條資料似可說明，東莞叛兵據守的“三門”，的確距離虎門不遠。不過，據俞大猷上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前夕致兩廣總督吳桂芳的《計叛兵必伏誅》書中所言：“哨探人三十晚自彼回，謂各船尚在三門。各徒分財不平，或在山，或在船，不相和合。湯克寬今午到白蜆，眾兵船今夜方到齊，四更決同開去。仗神武，可以畢事矣。不宣。”^⑦此外，當時俞大猷在《與莫吉亭海憲書》也提到了叛兵集結的相關情況：“叛兵尚留九

① 葡萄牙學者羅理路依據傳教士檔案史料，認為叛兵進攻澳門受挫後，“退到了‘東莞’鎮打消了攻佔澳門的意圖。東莞‘距廣州有一天的路程’，他們又以東莞為出發點，加緊襲擊這個中國大都市”。參見[葡]羅理路（R. M. Loureiro）：《澳門尋根》，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27頁。

②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132頁。

③ 黃慶華：《對明代中葡關係中幾個問題的考察》，《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2005年第6期。按：此文以“三門海”釋“叛兵據守的海澳”，本身也有不妥之處，因為在明清時期的東南沿海一帶，“澳”或作“灣”，亦作“澳口”或“泊口”，實即今天通常據說的“港灣”之義，與稱作“海”（指靠近大陸，比洋小的水域）的地名，在地理概念上是有明顯不同的。

④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上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208頁。

⑤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2頁。

⑥ [明]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下《書與巡撫熊及二道》，[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7頁。

⑦ [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15《與兩廣東軍門自湖吳公書十九首·計叛兵必伏誅》，[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0頁。

大船不送，見泊三門。軍門必欲猷得此九船，並其首惡數人。今尅三十日晚，出兵至彼攻之。合用米，乞先發五百石備用。恐賊知風遁走，以為長追之糧。又恐兵船由前門進，賊以哨馬及龍頭划，由後門淺水出來驛前攻我。公星夜差人至石壁地方，唯續取橫江船十餘隻，及趙陞哨船、馬賢哨船四五十隻，俱來驛前防之。”^①這兩條原始文獻資料，都清楚地記載當時東莞叛兵餘黨集結的具體地點是在“三門”，而不是“三門海”。而在明清時期的相關地方志和輿圖上，東莞虎門附近既有“三門”，又有“三門海”，兩者雖然相距不算過遠，但其實並不在一處。這也就是說，前人所持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具體戰場是在“虎門附近之三門海”或“東莞虎頭門之外之三門海”的說法，均有失準確。

二、明清地志與輿圖中所見“三門”與“三門海”的方位

“三門”地名，東南沿海常見的地名，通常是因某一海門之中又有兩個島嶼並峙從而形成三個小海門而得名。從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和相關輿圖來看，當時的珠江口一帶，涉及“三門”地名的地方，至少有以下四處：

其一是香山縣西南境的三門山或三門滘。《（道光）新修香山縣志》記載：“三門山，在海中。三山齊斷如門，今皆成田，僅留小河。前半里曰竹洲山，為達邑城要津。”^②《（光緒）重修香山縣志》記載更詳：“三門山，在海中（祝《志》），城西南八十五里（《廣東圖說》）。三山齊斷如門，今皆成田，僅留小河。前半里曰竹洲山（《廣東圖說》作竹洲頭山），為達邑城要津（祝《志》）。城西南八十五里，北為三門滘（《廣東圖說》）。 ”^③香山縣西南境的三門山及其北面的三門滘，距離東莞叛兵活動區較遠，當然不會是“三門之役”的戰場。

其二是指今珠江口外三門列島之三門島，明萬曆《粵大記》附圖標注為“小三門”，清初陳倫炯《海國聞見錄》附圖標為“三門”，乾隆《澳門紀略》海防屬總圖示有“三洲門”。“三門”即今三門島，“三洲門”很可能也同指此島，因與竹灣頭、橫崗、黑洲島之間海域如三門，故名。^④道光《廣東通志》海防圖作“三門山”。^⑤此外，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廣州石經堂承印出版的《廣東輿地全圖》之《新安縣圖》上，今珠江口外三門列島之三門島也有清楚標注。^⑥在王之春《清朝柔遠記》所附《沿海輿圖》的廣東沿海部分，^⑦在虎門東南方向、新安縣南境之外伶仃島西面也標注有“三門”地名，並繪有三個門的形態，頗具示意性質，但卻沒有

① [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15《與莫吉亭海憲書》，[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0頁。

② [清]祝淮：《新修香山縣志》卷1《輿地上·山川》，陳澧等纂：《中山文獻（三）》，台北：學生書局，1965年，第86頁。

③ [清]田明曜：《重修香山縣志》卷4《輿地上·山川》，陳澧等纂：《中山文獻（五）》，台北：學生書局，1965年，第98頁。

④ 崔乃夫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6621頁。

⑤ 魯延召：《明清時期廣東中路海防地理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176頁。

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72頁。

⑦ 此圖的虎門一帶地圖部分收錄於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毛贊猷編輯：《東莞歷代地圖集》，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2年，第25頁；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23頁。

反映出組成三個門的諸島嶼的具體形態。^①上述諸圖中所見的“三門”，遠在珠江口外，儘管在“三門之役”發生時仍屬於東莞縣管轄範圍，但已屬於遠離虎門之外洋，自然不會是俞大猷反覆提到的“三門”。

其三是虎門東南側的“三門”。此“三門”之地名，又作“三門口”，在多種明清輿圖中均有標注。如在道光《廣東通志·海防略二》之插圖中，虎門寨城之南，不僅標注有“三門口”，而且還標注有“三門炮台”，“三門口”的兩個島嶼也清晰可見。^②此外，繪製於清同治六年（1867）以前的《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上，在虎門寨與太平汛之東南雖然未標注“三門”或“三門口”字樣，但清楚地繪出了當地的地理形勢：兩個東西向橫排的小島將所在海口分成三個海門，並分別被稱作東角門、正門口和西角門，相關文字注記中還明確說“東角門水深三丈二尺”、“正門口水深三丈”、“西角門水深三丈”。^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圖是一字橫排格式，所以虎門寨、太平汛兩地與三門口的相對關係有些失真，尤其是三門口內的水道被完全繪成東西走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廣東沿海圖》上，“三門口”兩個島的西側均有一個更小的島洲。^④而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廣州石經堂承印出版的《廣東輿地全圖》之《東莞縣圖》上，在虎門東南，太平墟汛與虎門寨的正南，廣濟墟與虎門廳的西面，同樣清楚地標有“三門口”字樣，此海門之南口有一個小島（實際上至少應當有兩個小島才有可能形成“三門”這樣的形勢），門內水道大致呈南北並折向西北走向。^⑤此“三門口”，正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的“三門”。

據成書於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時任東莞知縣仲振履所著的《虎門覽勝》記載：“虎門寨城，明萬曆十六年建，初在武山，以水淺不能灣泊船隻，改建三門內。”^⑥“三門，在寨城南八里。潮汐所出入也，兩岸皆山，形若峽，中瀝復平，列二山，劃為三門。中門近已淤淺，師舟不能行。左為上門，凡艘船之至自新安者，皆出入於此。右為下門，門外為拈洲山。武山在其西門內，有沙坦一頃許，舊寨村民梁壯蘭所私墾也，師舟出入多窒礙。後復搭寮聚匪，滋事不法。

①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20《沿海輿圖》，趙春晨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37頁。這個《沿海輿圖》的廣東沿海部分，被有些著作稱為《廣東沿海形勢圖》，其中的虎門一帶地圖部分收錄於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毛贊猷編輯：《東莞歷代地圖集》，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2年，第25頁；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23頁。

② [清]阮元：《廣東通志》卷124《海防略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10頁。此圖之虎門一帶地圖亦收錄於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毛贊猷編輯：《東莞歷代地圖集》，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2年，第24頁；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24頁。

③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44—45頁。另外，《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的珠江口與澳門地區部分又收錄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84頁；虎門地區部分又收錄於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38頁。

④ 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毛贊猷編輯：《東莞歷代地圖集》，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2年，第43—44頁；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36—37頁。

⑤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59頁。

⑥ [清]仲振履：《虎門覽勝》卷上《虎門寨城》，夏荃校，廣州：暨南大學館藏漢畫軒抄本。

總督蔣以坦入官。今為中營牧馬之所，有營汛。”^①可知，雖然“三門”是“在寨城南八里”，但虎門寨以南的水域及其周邊陸地，皆可被視為“三門內”。所以，明清時期所謂的“三門”，狹義是指“三門口”，而廣義上則包括“三門口”以北、虎門寨以南的整個區域，與“三門海”不僅不在一地，而且在地名的內涵方面也有一定的區別。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在推測繪於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間的《廣東各府輿圖》與《廣東各府輿圖並說》中的《廣州府圖》上，^②在虎門寨之西南、小橫當正南、大橫當與三洲山東南東北方向，均標注有“三門”字樣，其中後一種《廣州府圖》上還繪有島嶼的形態。這兩幅地圖中所標注的“三門”位置，大致是在今虎門西南面的洋面之中，有明顯失實之處。但持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具體戰場是在“東莞虎頭門之外之三門海”的說法，極有可能是受這兩地圖的影響。

至於“三門海”，在明清輿圖中也多有標注，但明顯與“三門”不在一個地方。如在推測繪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後的《廣東廣州府輿圖》之《東莞縣圖》上，在虎門寨之西北，大虎頭山和小虎頭山的正北方向的海域，標繪有“三門海”字樣。^③論其位置，大致相當於後來人們習稱的獅子洋。此外，在推測繪成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雍正七年（1729）之間的《廣州府圖說》上，在虎門以北海域也標注有“三門海”。^④此兩圖中“三門海”之得名，似與大、小虎頭山與東西兩岸形成的三門形勢有一定的關係，但與虎門東南之“三門”或“三門口”明顯不在一地。雖然此“三門海”可能為柘林叛兵一度活動過的海域，但不會是遭受重創後的叛兵餘黨聚居之地，也不會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中的“三門”。持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具體戰場是在“虎門附近之三門海”者，顯然是將虎門東南的“三門”與虎門北側的“三門海”混為一談，其結論顯然是靠不住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虎門東南的海域也有被稱為“三門海”的海域。如在《廣東廣州府輿圖》之《新安縣圖》上，新安縣城西北、合蘭洲以北海域，就標有“三門海”字樣。^⑤另據《（嘉靖）廣東通志》記載：東莞縣“又南八十里，有合蘭洲”；“又西南二百里曰合連海（在缺口巡司之南，水道東南通大洋，連深澳、桑洲、零丁諸山而匯於此。又南有海南柵，有民居）”；“又西南六十里曰三門海（海上有三洲，潮來自東南，至此三分，過此復合連，至于三門海焉）”。^⑥所述相關地名、相對方位和里數有些混亂，綜合起來判斷，其中所謂的“合蘭”當為“合連”之誤，“合蘭洲”原當作“合連”，係“海上有三洲”之“三洲”的合稱，^⑦其北面即“合連海”（前引《廣東輿地全圖》之《東莞縣圖》中在三門口內標出了“合瀾海”，位置

① [清]仲振履：《虎門覽勝》卷上《三門》，夏荃校，廣州：暨南大學館藏漢畫軒抄本。

② 兩種《廣州府圖》分別收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36、37頁。

③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6頁。此圖亦收錄於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8頁。

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21頁。

⑤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廣州歷史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16頁。

⑥ [明]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13《輿地一·山川上》，廣州：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1997年，第295頁。按：“至于三門海焉”之“于”，原書刻作“千”，誤，徑改。

⑦ 此“海上有三洲”之“三洲”，當即推測繪於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間的《廣東各府輿圖》與《廣東各府輿圖並說》中的《廣州府圖》上之“三洲山”。

或不確)；而所謂的“三門海”，則又當在“合連海”、“海南柵”之北，論其位置，明顯是指前述“三門”或“三門口”以內的海面。“海南柵”之“海南”，似即因位於“三門海”之南而得名。不過，或許此海海面不是十分寬闊，在珠江三角洲河口一帶屬於通常人們所說的“細海”之類，所以海名不彰，往往為“三門”或“三門口”地名所涵蓋，以至於在大多數輿圖中不見標繪，^①或者即使有標繪，相對位置也往往出現錯誤。此“三門海”的確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中的戰場所在，但相關中文古籍史料往往只記述為“三門”。這大概主要是因為其海域範圍不廣，而“三門”之形勢卻十分顯明，所以“三門”地名在當時比“三門海”更為響亮。

三、耶穌會檔案史料所見“三門之役”具體戰場的地理形勢

筆者斷定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門之役”具體戰場是在虎門東南之“三門”（又稱“三門口”）而非虎門北面之“三門海”，除了俞大猷所記確實是“三門”而不是“三門海”這樣的直接證據以外，還可以從耶穌會檔案史料中找到有力的佐證。

據成書於1565年（“三門之役”之次年）的《若昂·埃斯巴爾關於至高至強之塞巴斯蒂昂國王派往中國的使節團的評述》（以下簡稱《評述》）的第15章記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協助明軍平叛的澳門葡軍，兵分兩路向叛兵集結地進發，其中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的船隊最先接近叛兵集結地，他派出的探子根據漁民提供的情況匯報說叛兵“共有九艘船，其中五艘在海上，四艘在陸地”。迪奧戈·佩雷拉原想立頭功，但隨船同行的中國官員以潮向不便為由，建議不要立刻攻打叛兵。“快到拂曉時，迪奧戈·佩雷拉發覺那位中國官員並沒有照原先自己所說的在該地點後碇泊，而是繼續從該地點向前航行，多走遠了一里瓜……他就派了一些中國人登岸去，到該島的另一邊岸上，從那裏監視海面，看看是否看到路易士·德·梅洛的船隊”；於此同時，路易士·德·梅洛（Luís de Melo）的船隊“凌晨開到了那島嶼[附近]，就在那裏，如前所述，它進入了迪奧戈·佩雷拉的艦隊的分隊（frota da armada）的視線。由於潮順風順，沒多久就開到了通往賊兵灣口的航道上，總兵看到已經逼近了，就帶領自己的艦隊停有稍後處，只有葡萄牙人的船隊仍然往前衝……這些船隻離開航道，開始駛進灣口時，賊兵們看見了。由於船上人人手持武器與火槍，他們就只消各就各位進入戰鬥崗位就行了，隨着船越來越接近，炮手們就將炮口瞄準，只待指揮艦發出‘聖雅各’口令，而指揮艦正在前進，進入了石彈炮射程之內。但是灣口是十分崎嶇的，路易士·德·梅洛的帆船碰到了[海底]；若熱·里貝羅·馬諾的那艘稍後開過來的帆船則越過了它，開到前頭去了……淹死在海中或死於刀劍或長矛之下中國人超過五百人，其餘登岸落荒而逃。這次勝利是在1564年10月7日禮拜六取得的”。^②上引羅馬耶穌會檔案史料的中文譯本，提供了“三門之役”的諸多細節，為中文史料所不及。

① 如在繪製於清同治六年（1867）以前的《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上，在沙角炮台所在的島嶼（實即“海南柵”或“海南柵山”）東南廣闊的海面上清晰地注有“合連海面”四字，但此島嶼西北的“三門”被細緻地標注為東角門、正門口和西角門，但三門內的海面卻未見標注“三門海”字樣。

② [葡]羅理路（R. M. Loureiro）：《澳門尋根》附錄《文獻匯編》，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119—121頁。

其一，上面所引《評述》中多次提到的“那島嶼”，很明顯是指海南柵所在的島亦即海南柵山，此島嶼為登岸的叛兵主要屯集之地；至於叛兵餘黨船隊集結的地方，的確不是寬闊的海面上，而是“那島嶼”的內側的“灣口”。至於其中“灣口是十分崎嶇的”一句，史料的整理者相關注釋是“Aparcelada：到處是礁石和淺灘”，^①與中文史料和輿圖中所記載或描繪“三門口”內河道的地理形勢完全吻合。由於三門口內的港灣環境複雜，“十分崎嶇”，加之如俞大猷曾經提到並有諸多明清輿圖資料相佐證的那樣，三門口以及灣內水道淤積情況比較嚴重，水深有限，所以是很容易造成船隻擱淺的。《評述》中所述“路易士·德·梅洛的帆船碰到了[海底]”的情況，顯然事出有因。

其二，引文中也提到了一個細節，說路易士·德·梅洛的船隊“由於潮順風順，沒有多久就開到了通往賊兵灣口的航道上，總兵看到已經逼近了，就帶領自己的艦隊停有稍後處”。當時負責“三門之役”總體軍事佈置的兩廣總兵俞大猷，深諳用兵之道，他讓明葡聯軍採用這種縱向攻擊陣型安排，顯然也是為了適應三門口內、水面相對狹窄的港灣戰場，因為如果是在廣闊的海面上，為了防止敵人逃竄，必須採用合圍戰術。無獨有偶，隆慶三年（1569）五月，福建、廣東兩省水師在潮州會剿曾一本海盜集團時，俞大猷也做過這類戰術安排：“賊在大洋，則堂堂正正，齊一進攻。賊在港次，遇單日，則福船先衝為正，廣船繼衝為奇；遇雙日，則廣船先衝為正，福船繼衝為奇。”^②

其三，引文中還提到，延誤了戰機的迪奧戈·佩雷拉的艦隊，“使勁划槳，逆着潮水，還是進入了灣口，他們發現了這處地點，而且看到原先離開時在那裏的賊兵船隻，但看到船隻的數目時大感詫異，因為此時有四十艘船隻，而上次看見時只有九艘”。^③這“四十艘船隻”，當即“三門之役”數年後即隆慶三年（1569）閏六月初九日俞大猷在《書與巡撫熊及二道》中提到的“白艚船四十隻”，俞大猷在書中稱“昔東莞叛兵有大烏船三十隻，白艚船四十隻。猷差人往撫，一一聽命”。^④明顯是誇大其詞，因為在同書的後文中俞大猷還提到，叛兵頭目在其威逼利誘下先後兩次送出大烏船21隻交到虎頭門以後，苦訴說“我今只存烏船九隻，不散者不滿千人。願官府給牌，許我往潮，販鹽買賣”，並沒有交待“白艚船四十隻”的存留問題。由此可知，俞大猷固然老於謀算，但叛兵頭目也留了一手。無論如何，澳門葡軍頭領迪奧戈·佩雷拉與廣東總兵俞大猷在“三門之役”戰後才在港灣內發現了大量白艚船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叛兵餘黨不是集結在易於被明軍發現的虎門以北或以南的海面上，而是隱藏於虎門東南之三門口內的港灣裏。如果說叛兵餘黨是集結於虎門北面的“三門海”（即獅子洋）或者三門口外的海面上，斷然是不會出現這種尷尬情況的。此外，前引俞大猷上兩廣總督吳桂芳的《計叛兵必伏誅》書中提到，據哨探報告說，叛兵餘黨“各船尚在三門。各徒分財不平，或在山，或在船，不相和合”。這裏的“三門”顯然是包括水面和陸地在內的一個地區，自然不能以虎門北面或南面的“三門海”當

① [葡]羅理路 (R. M. Loureiro)：《澳門尋根》附錄《文獻匯編》，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128頁，注53。

② [明]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下《答總督軍門劉揭帖》，[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5頁。

③ [葡]羅理路 (R. M. Loureiro)：《澳門尋根》附錄《文獻匯編》，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122頁。

④ [明]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下《書與巡撫熊及二道》，[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2007年，第897頁。

之。在清《廣東沿海圖》、《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等諸多輿圖上，“三門口”內港灣之水道兩側多為島嶼型山地，正與《計叛兵必伏誅》所述叛兵餘黨盤踞地區的地理形勢相合。

總之，上述論證已充分揭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軍與澳門葡軍聯合平定東莞叛兵餘黨之“三門之役”的具體戰場，是在虎門東南的三門口內的港灣裏，“虎門附近之三門海”或“東莞虎頭門之外之三門海”之類說法均失之籠統，也沒有反映出具體戰場的地理形勢特點。

四、柘林叛兵退守三門口一帶的原因

柘林叛兵退守三門口一帶，是有其特殊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就近依託自己的根據地。據前引《明實錄》，柘林叛兵“數入外洋，與東莞鹽徒及海南柵諸寇合，進逼省城”。其中的“海南柵”，是明代東莞縣地名，為一海島村落，隸屬於縣西南第七都。^①《（崇禎）東莞縣志》之《東莞縣圖》、《（康熙）東莞縣志》卷首之《缺口司圖》，在“缺口司”之東南的對海島嶼上均清晰地標注有“海南柵”地名。^②三門口東側的海南柵所在的島，在《（道光）廣東通志·海防略二》的插圖上，則標注為“海南柵山”。^③據清人仲振履《虎門覽勝》記載：“廣濟墟，在三門內。嘉慶十五年，總督百（按：即百齡）移缺口司署於此。山之南，為海南柵諸村。寧洲村小徑紆折，可通沙角炮台。總督百受張保降，由是徑至沙角，多使君子，藤本蔓生，花有紅、白二色，實如梔子。”^④根據此條史料可知，明代就已設置的缺口巡檢司，其司署的位址清代曾經發生過變化，而“海南柵”則是在“三門內”的廣濟墟之南，屬於三門口東南側的一個島嶼。海南柵也是明時東莞鹽場的重要產鹽區之一。當時東莞縣鹽場鹽課司的組織結構是場下設柵。據清人陳伯陶《東莞鹽法志》引《兩廣鹽法志》，明洪武二年廣東提舉司領十二場，其中東莞縣境有靖康、歸德、東莞、黃田四場，後來黃田併入東莞場。^⑤各場所管柵數不一，而海南柵即東莞場八柵之一柵。^⑥

俞大猷在《又與劉凝齋書》中，曾經總結過東南沿海一帶明軍海防船隻的類型與水兵來源：“海上戰船，在山東不得知。在南直隸，則有沙船。駕船之兵，則江北等處鹽徒也。此方江海相交，淺沙甚多。沙船不甚大而底平，故南直隸多用之。在浙江，則有蒼山船。駕船之兵，則台州等處之漁民也。此船大者可載七八百石，小者可載三四百石，故浙江多用之。在廣東，則有東莞之烏尾，可載三四千石。新會之橫江，可載七八百、一二千石。駕船之兵，則二縣之商徒，名曰

① [明]張二果、曾起莘：《（崇禎）東莞縣志》卷1《地輿志》，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編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二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64頁。

② 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毛贊猷編輯：《東莞歷代地圖集》，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2年，第8、13頁；毛贊猷、李炳球編著：《東莞歷代地圖選》，東莞：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第6、13頁。

③ 《（道光）廣東通志》卷124《海防略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10頁。

④ [清]仲振履：《虎門覽勝》卷上《廣濟墟》，夏荃校，廣州：暨南大學館藏漢畫軒抄本。

⑤ 黃國信、鍾長永主編：《珠江三角洲鹽業史料匯編——鹽業、城市與地方社會發展》導論二《東莞鹽法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頁。

⑥ 周琍：《清代廣東鹽業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7頁。按：東莞場八柵，分別是南頭、辛甲、海北上、海北下、海南、港頭、市心、豐福半柵，實為七柵半，周文誤作“八柵半”；另外，海北上、海北下兩柵，可能在《（康熙）東莞縣志·缺口司圖》中的“北柵”一帶。

後生者也，故廣東多用之。在福建，則有白艚船。駕船之兵，則福清縣之鹽民、漳泉之商民也。此船大者可載二三千石，中者可載七八百、一千石，下者可載五六百石，故福建多用之。”^①其中提到當時廣東東莞和新會的水兵多為“二縣之商徒”。其實，如果結合前引俞大猷《書與巡撫熊及二道》書中所引東莞叛兵表示“願官府給牌，許我往潮，販鹽買賣”可知，其主要成份當是“販鹽”的“商徒”，也就是《明實錄》中提到的“東莞鹽徒”，^②其中大概有不少是海南柵的鹽徒。當時廣東海防水兵實行募兵制，即僱募民兵民船，並採用“隨糧帶徵法”來解決軍糧供應問題。^③東莞鹽徒被徵為兵則為水兵，未被徵兵者則仍為鹽徒，鋌而走險者則為“諸寇”，籍貫是相同的，身份也會不斷轉化。這也正是柵林叛兵到達原拓籍東莞地面後很快就“與東莞鹽徒及海南柵諸寇合”的主要原因。

陳賢波已經注意到了柵林叛兵在珠江三角洲與“海南柵寇盜”的合流，^④但由於考察的重點放在了“柵林兵變”而不是“三門之役”，所以沒有將“海南柵”與叛兵最後被平定的地方聯繫起來。結合相關史料不難斷定，柵林叛兵在受到官軍重創以後，退守於東莞三門一帶，其實正是為了依託“海南柵諸寇”原來盤踞的老巢即三門口內港灣和海南柵山，以便能夠負隅頑抗，或爭取較為有力的歸順條件。只不過由於叛兵餘黨原來的派系比較複雜，加之“各徒分財不平”，所以“或在山，或在船，不相和合”，加之又受到明軍、澳門葡軍的聯合攻擊，導致了最後的覆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據前引俞大猷在《與莫吉亭海憲書》，“叛兵尚留九船不送，見泊三門”，他擔心如果準備不足，倉促出擊，可能會造成“賊知風遁走”，或者“兵船由前門進，賊以哨馬及龍頭劃，由後門淺水出來驛前攻我”，所以建議“星夜差人至石壁地方，唯續取橫江船十餘隻，及趙陞哨船、馬賢哨船四五十隻，俱來驛前攻之”。這裏提到的“前門”和“後門”，顯然分別是指三門口和三門內水道的北口。有研究者分析認為，當時叛兵餘黨的規模仍相當可觀，共有大烏船30隻、白艚船40隻，俞大猷先後“差人往撫”，誘使叛兵將21隻大烏船“送還官府”，並答應其提出的“願官府給牌，許我往潮州販鹽買賣”的要求，繼而俞大猷趁叛兵後剩餘船隻在岸停泊之機，出其不意，“以其送回二十一隻船載兵往擊”。^⑤這樣的分析是相當細緻的，不過，如果結合俞大猷《與莫吉亭海憲書》中的資料便可進一步知道，當時叛兵主要集結於三門口一帶，明軍攻擊策略則是集中各路兵力，堵住叛兵逃路南北逃路，一舉將叛兵餘黨殲滅在三門口內的港灣（水道）裏面。由此可知，柵林叛兵失利之後，選擇退守三門口一帶負隅頑抗，容易被敵軍圍困，在軍事上是一個大的失誤。而老於謀略的俞大猷正是抓住了柵林叛兵的這個失誤，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勢從容佈置，指揮明葡聯軍順利取得了“三門之役”的完勝。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明]俞大猷：《正氣堂續集》卷1《又與劉凝齋書》，[明]俞大猷撰：《正氣堂全集》，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6頁。

② 據當時香山人黃佐的說法，烏艚船子弟兵“俗呼‘莽仔’，其商販頗類淮海鹽徒”。參見[明]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三·海寇》，廣州：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1997年，第1784頁。

③ 陳賢波：《柵林兵變與明代中後期廣東的海防體制》，《國家航海》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

④ 陳賢波：《柵林兵變與明代中後期廣東的海防體制》，《國家航海》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

⑤ 陳賢波：《柵林兵變與明代中後期廣東的海防體制》，《國家航海》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